

辛亥革命前陈独秀的政治活动

胡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陈独秀在辛亥革命前曾有过一段投身“乱党”的日子。他参加过反清志士的秘密团体“暗杀团”,发起并领导过反清斗争的革命组织“岳王会”。但许多相关历史真迹已湮没不闻,或语未能详。寻索陈独秀早年政治活动的心理轨迹,清理其投身革命的思维逻辑,诠释其斗争风格的形成契机,这对于陈独秀后来的革命事业无疑也是一种历史渊源。

[关键词]陈独秀;辛亥革命前期;政治活动;心理轨迹

[中图分类号] K256.9;D0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4)01-0047-07

陈独秀与“少年时代”告别的最重要标志是江南乡试失败后的思想转变。他多次提到过,从科举的迷雾中醒悟过来,是他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在江南乡试的考棚中,“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往后十几年”大抵算在辛亥革命前后,正是他“从康梁到乱党”的那一段极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陈独秀赴江南乡试时正是甲午战败、国家剧变的历史重要时刻。就在陈独秀于安庆考中秀才第一名时,梁启超在上海编辑出版了《时务报》,发表了号角式文章《变法通议》,又编辑出版《西政丛书》。在这之前一年,康梁领导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运动,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强学会”,发行《万国公报》,其上海分会也发行了《强学报》,鼓吹变法图强。陈独秀乡试落榜的同时,梁启超主讲同年开办的长沙时务学堂,也积极鼓吹维新,推进变法——全国范围的维新变法宣传热潮涌起。陈独秀也在安徽乡间的舆论场合积极为康梁维新理论作鼓吹宣传,批驳以叶德辉《翼教丛篇》为代表的顽固守旧舆论对康梁的污蔑攻击,并被乡间的顽固守旧势力目为“康党”。陈独秀后来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载《新青年》2卷4号)中有一段回忆:“甲午之役,兵破国削,朝野惟外国之坚甲利兵是羨,独康门诸贤洞察积弱之原,为贵古贱今之政制学风所致,以时务知新主义号召国中。尊古守旧者,觉不与其旧式思想、旧式生活状态相容,遂群起而哗然非之,置为离经叛道,名教罪人。湖南叶德辉所著《翼教丛篇》,为当时反康派言论之代表也。吾辈后生小子,愤不能平,恒于广坐为康先生辩护,乡里督儒,以此指吾辈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

当然,当时的陈独秀还生活在政治文化圈的边缘,只是在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潮下溅濡上许多新政治、新文化泡沫的热血青年。他本人现代政治文化的启蒙正是康梁一辈时代精英给予的,康梁的政教学术的维新思想点燃了陈独秀知识启蒙、思想革新的火把,使陈独秀走出少年时代就已变成了一个文化新人:

吾辈少时,读八股,讲旧学,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谈新学者,以为皆洋奴,名教所不容也。后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灿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1]

[收稿日期] 2003-03-31

[作者简介]胡明(1947-),男,安徽绩溪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

陈独秀自觉做了“康党”的又一个重要标志,是他也拿出了与康梁类似的关于国家大事深思熟虑后的政治意见或者说改革主张,这便是近七千字的政论(也可算是一种策论)——《扬子江形势论略》,他在此文中提醒清廷和海内有识之士认清国家所处政治形势的严峻险恶,亟需采取相应的救国措施。正是怀着深沉的忧国忧民的“杞忧”,又是秉承了清初以来一脉以地理学为国为民分忧的士大夫学术传统,陈独秀——这个扬子江边的血性男儿,赤胆加上忠心,把目光注视在他脚下的那条浩荡万里的扬子江。扬子江地理学正是那个时代特定的经济学——经邦济世之学的一个最佳切入处。

这份地理学和军事学的良策,即所谓“形势论略”,无疑也暴露了18岁的陈独秀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与军事形势的缺乏认识。古舆地山川、古军事谋略,文章洋洋洒洒,毕竟是纸上谈兵,书生议政,许多意见是很幼稚的,却可感受到他的一片拳拳诚意和胸中鼓荡奔流的一腔热血。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18岁的陈独秀将太平天国运动认作是谋反的“粤逆”,先是“粤逆蜂生”,然后有曾胡诸公的“出山”通靖长江,荡平东南。此时的陈独秀还想着做“末世”的“曾胡”(“中兴”的事业轮不到他了)。他的这份策论在军事上既防内乱,重点是御外侮,明确是为国家社稷出谋划策的。早年陈独秀肯定做了不少此类策论,大概多数不很满意,故没有特别保留下来。尽管陈独秀的这篇政论“处女作”没能公开发表,事实上也没有发生任何社会影响,但历来的陈独秀研究者与叙述者均把它看作是陈独秀存世的第一篇“文章”,是陈独秀第一次对外部世界的亮相“对话”,意义重大。也正是从这篇文章的内容倾向上,我们将18岁的陈独秀看作是“康党”分子,他在思想意识与理想追求上已经与康梁站在一边了。这是陈独秀早年政治兴趣与入世情结的显现,它的高潮便是1903年5月17日的安庆藏书楼演说。

1903年是陈独秀政治热情最高涨的一年。在这年的抗俄运动中,陈独秀表现出非凡的组织能力与演说才华,当然,他的勇气也是十分令人钦佩的。20世纪初的几年内,中俄关系严重敌对,庚子义和团运动后,八国联军进占北京,同时俄国单独出兵强占东三省,血洗海兰泡,制造震惊中外的江东六十四屯大血案,屠杀我东北边民。1902年,清廷与沙俄签订了《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自签约之日起,俄军人分三期撤回远东境内。但到了1903年4月,沙俄又变卦违约,不仅拒不撤军,反而向清廷提出七条无理要求,企图长期霸占东北。消息传出,上海、东京两地十多万民众集会示威,万众一心,一致抗俄。陈独秀一个月前已被迫从日本潜回国内(为惩罚中国官厅学监姚昱事被日本警厅搜捕)^①。5月17日,陈独秀在安庆组织了一个三百余人参加的拒俄集会,地点在安庆城中的藏书楼。尽管天下大雨,但群情激昂,集会气势十分雄壮,陈独秀本人的演讲便打动了不少人。陈独秀含着热泪,先逐条批驳了“俄约七条”^②,声称:“诚如是约,举凡政权、商权、矿路权、兵权、税权,均归俄人之手,则东三省已非我有……我政府若允此约,各国必执利益均占之说瓜分我中国;若不许,则必与俄战。我国与俄国之仇固结不解,我国之人有一人不与俄死战皆非丈夫!”接着,陈独秀以自己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之事实,一一揭露俄国在东北的暴行(他曾在其继父所在的东北“新民官厅”里协助文书工作)。说到痛心疾首时,陈独秀吐出了自己悲怆的心声:

各国将来瓜分我中国,其惨状亦何堪设想!我中国人如在梦中,尚不知有灭国为奴之惨,即知解而亦淡然视之,不思而起救之。盖中国人性质,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

① 清廷派往东京的湖北省学监姚昱处处与留学生作梗。据章士钊《疏(黄帝魂)》记载:“姚昱一风尘下吏,偶辖一省海外学务(时充湖北留学生监督),无端摆留学生之逆鳞,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稍稍发打割发代首之恨。驯致酿成交涉大故,三人被遣返国。”

② 所谓“俄约七条”大致有如下条款的内容:东三省官制中国政府不得擅改,不准东三省开辟通商口岸,东三省矿产独归俄人开采,东三省铁路全归俄兵保护,东三省练兵必须延聘俄人,奉天牛庄关税归俄人管理,俄国于三省省城设商务局等。确如陈独秀所说,“诚如是约”,“则东三省已非我有”。

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外国人性质只争荣誉,不争生死,宁为国民而死,不为奴隶而生。其性质相异如是,其现象亦各自不同。故各国人敢于出死力以侮我中国者,皆云中国人无爱国心,只知贪生畏死,虽如何辱之,彼亦不敢反抗,即瓜分之,中国人决不敢多言。呜呼!我国人果真如此耶?抑彼族妄言耶?思之当一大痛哭。

说到这里,陈独秀所“痛哭”的已经是中国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淡漠与冷血。国难当前,他举出四种人的表现,令人寒心:

第一种,平日口谈忠孝,斥人为叛逆,一遇国难,则置之不问,绝不肯兴办公益之事,惟思积款于外国银行,心中怀有执顺国旗降敌一大保身妙策,是为国贼,是为逆党。是等国贼、逆党不杀尽,国终必亡。

第二种,只保身家,不问国事,以国家之兴衰治乱,皆政府之责,人民何必干预?不知国事不支,岂政府独受其累!各人身家又焉能保?全国中无深谋无虑之绅商皆此类也。

第三种为似开通而不开通之士流。以空言无益,责行实事。此论极是,但其并不能实行,较之空言尚可发人思想,犹居其下流也。

第四种草野愚民,不知俄约之迫,亦不知瓜分之说,其爱国思想更何由发达?全国中乡鄙农民皆是也。

凡我国中人,十有九不出此四种,国安得不亡!种安得不灭!全国人既如是沉梦不醒,我等既稍有一知半解,再委弃不顾,则神州四百兆人岂非无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之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庶使后世读中国亡国史者,勿谓此时中国无一人也——此即今日开会本意。

这里固然明显地可以看出陈独秀深入骨髓的仇俄情结,以至于发出“我国之人有一人不与俄死战皆非丈夫”的吼声。这与陈独秀18年后追随苏俄,全身心投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当是两重绝不相同的思想境界与理想内容。但潜藏深处的仇俄情结,又使他在大革命失败后把一股怨屈都记恨在苏俄领导与共产国际的头上,从“八七会议”前后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策略的猜疑,以及“六大”死活不去莫斯科,甚至到晚年对苏俄国家性质与斯大林本人的激烈批评等等一系列表现来看,我们似乎还能细辨出青年时期陈独秀内心深处潜伏下来的对俄国的复杂微妙的情绪与心结。这时的陈独秀扯起的仍是抗俄爱国守土、知耻勇毅尚任的大旗,几乎没有革命排满的成分。在政治舞台上一出场,陈独秀更多散布的是爱国爱民族的思想,更多地看到并大胆指正的又恰恰是国民性的愚阉怯懦,自私苟且,冷淡麻木。而他自己更多地以先知先觉的身份来力挽狂澜,投身于亡国灭种的危机的化解与世道人心沉沦的挽救。

如果说,1903—1904年间陈独秀奔忙于文字宣传与讲演鼓动,用心在国民的思想启蒙与爱国意识的培养,稍后他参加暗杀团、组织“岳王会”的革命行动,便显得顺理成章了。“乱党”是肯定会做的,这是激进青年知识分子在那个特定时代心理演化的逻辑必然。但策划于暗室的暴力革命,用血肉之躯犯上作乱去拼杀一个反动政权的行动究竟能坚持多久?进行到何种程度?理性的思索与经验的内省又是另一个逻辑必然。陈独秀一生究竟要做怎样性质的事业?事业做得多大?历史将降落在他肩头的任务究竟是什么?他有能力去完成么?以什么形式去完成?用什么技术去完成?

就在1903年5月安庆藏书楼拒俄讲演的隆重政治集会后,陈独秀、潘赞化等就策划成立“安徽爱国社”了。按当时的设想,这个爱国社假如办得有基础,“拟与上海爱国学社通成一气,并连接东南各省志士,创一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异族之侵袭”。按当时陈独秀手拟的章程,其宗旨即是:“因外患日亟,结合士群为一团体,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发扬爱国思想与尚武精神,执干戈以保卫社稷,排除外患,恢复国权。而且组织的主干是“士群”——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但性质不是反叛的而是捍卫的,行为规则以“激发志气,灌输学理”

为主,“不得讪谤诋毁,致涉叫嚣”,并明确强调“本社既名爱国,自应遵守国家秩序”。社中又设“戒约”若干,有两条“戒约”值得注意:一条是“戒主张各人自由,放弃国家公益”;另一条是“戒盲昧仇洋”。这两条戒约对陈独秀后来一生的革命理念与实践均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有牵掣掣肘的,有辅助推进的。虽然爱国社的性质和平理性如此,但还是被愚顽骄横的清朝官厅勒令解散了。

1904年,几乎就在陈独秀组织成立“爱国社”的同时,杨笃生、苏凤初、何海樵等反清革命志士已成立了“暗杀团”,决定全面推进“鼓吹、暗杀、起义”三大任务,而以“暗杀”为重头工作。上海设分会后,又引入蔡元培、钟宪鬯、章士钊等人,章士钊又发函引荐陈独秀加入。据蔡元培叙述,参加“暗杀团”还有极严密的人会形式:

开会时,设黄帝位,写誓言若干纸,如人数,各签名每纸上,宰一鸡,洒血于纸,跪而宣誓,并和鸡血于酒而饮之。其誓言,则每人各藏一纸。[2](p.93)

陈独秀晚年在《蔡子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也回忆道:

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时杨笃生、何海樵、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这时子民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谈。[3]

陈本人虽参加了暗杀团,也参与过试验炸药,但对“暗杀”这一革命方式似乎很快产生了怀疑:一是怀疑手段的正当性;二是嫌厌性质的残忍性;三是也许不再相信暗杀的有效性^①。尽管暗杀是清末的革命志士常常选择的一个激烈手段,但陈独秀却并不从心底里赞赏暗杀行为,所以在行动上也缺乏热情与信心。他更愿意用自己的一支笔从事理性的宣传和鼓动,传播革命的理念与理想,何况他自己从小就具备了一种反对“杀人”的心理基础,对此,我们读他的《实庵自传》就可以知道。从现存的各种史料上,我们也几乎找不到有陈独秀直接参与“暗杀团”的具体行动的记载。但对一个头脑里充满革命排满激情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暗杀如果成功了,总会产生痛快淋漓的感觉,激荡起崇高壮烈的美感,即是说总会从感性上表现支持与欣赏,这是一种普遍的革命情绪,无论是谁,都会堕入这种思维情绪的快感中。如胡适,他的理性主义远比陈独秀稳定,面对诸种剧烈的社会政治问题与现实矛盾冲突,高度的理性时时占据上风,故而时时与“广大群众”意见相左,成为被误解的少数,甚至陷于孤立。胡适著名的《四烈士冢的没字碑歌》,就是为用炸药暗杀的好汉大声叫好、高唱赞歌的。歌云:“他们是谁?三个失败的英雄,一个成功的好汉!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他们的精神:干!干!干!”“四烈士”指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彭家珍——前三人用炸药炸袁世凯,失败而死;后一人炸良弼,成功而死。胡适明白,承认搞暗杀的是“英雄”,是“好汉”,用“炸弹”而“实干”的人无论成功或失败,都在感情上得到胡适、陈独秀们的同情与喝彩。但在理性主义的底蕴上,他们又不赞同这种革命手段,更不用说自己实际去参与暗杀活动了。陈独秀在暗杀团的一段经历是革命生涯中淡淡的一笔,几乎是瞬间即逝了。他真正投入的革命活动则是他亲自筹建的“岳王会”。

在清末排满革命中起十分重要作用的教育机关是安徽公学。安徽公学以培养革命青年骨干、散播革命种子为教学主旨。学校内经常宣讲革命理论,传阅革命书刊,它的师生成为后来辛亥革命的主要策动者之一。这所学校原是开办在湖南长沙的“安徽旅湘公学”,是皖人李光炯与卢仲农创设的。由于陈独秀的大力运动,学校于1904年决定迁到芜湖开办,所以,后来高语罕说:“迁校运动的中心人物,就是陈独秀。”1905年2月,安徽公学正式在芜湖开学,校址就在繁华的“二街”上。初

^① 1923年1月,当时已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在《向导》周报第18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暗杀、暴动及不合作》的文章,文章指出:“暗杀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又说:“暗杀所得之结果,不但不能建设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而且引导群众心理,以为个人的力量可以造成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可以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此种个人的倾向,足以使群众的社会观念、阶级觉悟日就湮灭。”这时,他已经从阶级斗争与个人力量关系的角度来科学地认识“暗杀”的问题了。

设中学、师范两部,首批招生五十余名,大都是皖省有志于革命的进步青年。学校步上教学正轨不久,陈独秀与柏文蔚、常恒芳等人就组织了“岳王会”。“岳王会”取岳飞的“精忠报国”为号召,是一个处于地下状态专搞军事异变行动的秘密机关。会员入会与暗杀团仿佛,也是采取歃血盟誓形式,不作任何宣传,绝对保守秘密,发展联络对象主要是安徽武备练军学生、新军下级军官以及警察学堂学生。为了更有效、更直接搞兵运,“岳王会”会员中有不少索性投入新军充当士兵^①。“岳王会”在发动新军武装起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形成强有力的革命力量。“岳王会”在组织形式上是旧式会党,但又是新式职业革命团体的雏形,中央设总部,地方设分部。陈独秀任总会长的总部设在芜湖,柏文蔚主持南京分会,常恒芳主持安庆分会,均称“分部长”。“岳王会”的活动采取秘密形式,其骨干分子吴旻谷、郑赞丞、倪映典、熊成基、龚振鹏等都通过公开或半公开的外围组织,如“维新会”、“华族会”、“同心会”等来进行反清活动。

“岳王会”创立后不久,孙中山也在日本创建了同盟会。为联络国内各地革命力量,孙中山指派一批同盟会干部回国筹建同盟会地方组织。派往安徽的恰恰是原“岳王会”会员吴旻谷——他在东京追随孙中山,并参与了发起同盟会的活动,他与安徽的革命组织关系密切,便被派回国内专做安徽方面的工作。吴旻谷回国先到南京,很快与柏文蔚、倪映典、胡维栋、龚振鹏等“岳王会”成员联络上,在鸡鸣寺召开秘密会议,首先吸收了南京“岳王会”分会成员参加了同盟会。又通过柏文蔚发展赵声入盟,推赵声为苏皖五省盟主(又称“长江五省盟主”)。吴旻谷随后又回到合肥,筹建同盟会安徽分部,所谓“江淮别部”,又名“武毅会”。一时间“武毅会”与“岳王会”同时在安庆、合肥之间活动。但此时的吴旻谷似早就把“岳王会”及陈独秀搁在了一边,全心全意地在安徽、南京宣扬孙中山的革命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②,积极推进并扩大同盟会的组织工作。原先许多“岳王会”成员中,也有不少改换门庭,投入了同盟会的组织。除柏文蔚率南京分部成员全部加入外,最初创建“岳王会”的常恒芳也转入了同盟会的营垒。1906年,孙中山又派遣张汇滔回安徽寿州组织“信义会”,派程恩普到颍州组织“安仁会”,他们与吴旻谷的“武毅会”一样,均是同盟会下的安徽分部组织,接受的亦是同盟会的政治纲领与行动原则。1906年夏,在吴旻谷等人的积极活动和串联之下,“岳王会”几乎所有的头头们通过总部决议“全体”加入了同盟会,惟陈独秀这个总会长表示不加入,并保持了惊人的沉默与自制——他悄悄地去了日本,这是他第三次赴日留学。

陈独秀当然明白同盟会的政治倾向与势力影响,也完全理解“岳王会”“全体”加入同盟会的意义。他对同盟会来挖自己“墙脚”自然会表示不满,但也阻止不了吴旻谷、柏文蔚等人的活动,也抵制不了他们活动之后“岳王会”的散架趋势,他惟一能选择的就是自己主动离开。同盟会的孙中山(还有光复会的陶成章、徐锡麟)当然知道陈独秀在安徽的革命地位与影响,但从骨子里却认他做江湖会党,颇多轻视,故意绕过他,与他的部下联络,继而全盘吸收他的“岳王会”组织班底。陈独秀当然从“大义”上会支持同盟会的革命排满的终极目标,但他对同盟会心底里是有成见的,这不仅表现为他在1906年去了日本,留了两年,却与近在咫尺的孙中山及同盟会总部几乎从未来往,反而参加了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发起的“亚洲和亲会”活动。而且,更进一步可以从1924年到1926年间的

① 常恒芳《记安庆岳王会》(收入《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中华书局1969年1月版)有过这方面的详细记载:“这年秋天,清政府决定在总督所在地成立一镇。由于干部不够,乃在安庆举办干部培训班,人员由绿营挑选。好的可以当头目,作为新军的干部。我感到要革命非有武力不行,看见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想进去,但是我不是绿营里的人,没有被挑选资格。因此,我找了督练公所中有两个从南京柏烈武那里来的教练员,请他们把我保送到训练班。这个训练班分五个队,每个队里都有我们的同志。我入训练班后,虽然是学员,但因为我是岳王会的安庆分部长,仍然可以对岳王会的同志起领导作用。那时,像迎江寺定塔里和大观亭后面的树林都是我们开会的地方。”

② 孙中山早年为“兴中会”拟定的“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参见广东中山市“孙中山纪念馆”陈列品)其中已包含有“政纲”的内容。

“国共合作”来看,那时,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与孙中山本人与同盟会演变成的国民党在“合作”的过程中,不断产生摩擦与矛盾,从个中反映出的诸多信息中,可以看出一点历史的怨嫌:陈独秀重视自己政治选择的自主性与独立性,他的直上峻坂、不肯回头的革命个性,与绝对领导、绝不臣服的首领心态,在他早期从事的“乱党”活动中就顽强清晰地显示出来了。

“岳王会”虽然全盘皈依了同盟会,但在安庆、芜湖一些地区的具体革命行动中,仍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它的最有影响的一次革命实践却是著名的熊成基安庆新军马炮营起义。事情发生在1908年11月26日光绪与西太后相继去世后的短暂的“政治真空”里。熊成基起义在安徽巡抚朱家宝的全力镇压之下旋即失败。清廷大规模捕杀革命者,受牵连的党人、士兵、学生无数,“岳王会”骨干殉难不少,基本队伍损失惨重。火种虽沉埋下来,但“岳王会”从此走进了历史。由于留下的文献纪录极少,今天的人在研究辛亥前革命史、研究陈独秀的早年乱党经历时,已经很难找到非常清晰的史料证据了。

陈独秀在辛亥革命前的乱党经历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比较模糊的,凸现出的几根粗线条也都时有斜出断续,很难连贯起来,其实际影响也都与他这个“主角”地位不相符。可以说,对“暗杀”、“兵运”、“起义”一类的“实践”革命,陈独秀不仅不内行,而且从文化心理的熏陶与知识训练的认识上,也似乎是心存排拒的。对恐怖暴力,对军事图谋,对权力迷信,早年的陈独秀并不感兴趣,他最感兴趣的似仍是“一管笔”所显示出的政治巨人的思想风采与理念魅力。陈独秀更期待自己是一个掀天动地的大儒,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在沉迷黑暗中掀起思想文化大潮,在思想文化领域推动铸成政治结构巨变的革命。在时代潮流与个人志向的双重作用下,他参加了暗杀团,但实际上没有参与过暗杀的策划与行动,除了对暗杀作抽象的歌颂并刺激情绪之外,陈独秀只能在感情上对参与暗杀而失败的英雄表示敬佩与怜悯;他组织了“岳王会”,投入兵运,但他一天的兵运都不会做,难怪柏文蔚、常恒芳、吴旻谷会舍弃他而投入注重实际革命运动的全盟会的怀抱。他只能退出政治的竞争,遁入学术文化领域。1906年夏秋,陈独秀第三次去日本后,真的将很大的精力与时间放在了学术文化、尤其是文学艺术的钻研与创造上。历史的选择与期待或许是让陈独秀从另一个突破口进入真正的政治革命的表演场地,推动真正的政治革命历史,并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革命巨人。

从1906年夏开始到1911年秋的辛亥革命五年间,关于陈独秀的史料很单薄,孤立的文献证例往往引导出矛盾的史实叙述,攻史料的、写评论的、作传记的、编年谱的各说各的,且往往以猜测推演居多。但有一点倒是学界普遍认同的:这几年之中陈独秀的革命活动处于低调期,甚至可以说通逸出革命的圈子,过着隐逸的、消闲的、多少有点优裕和浪漫的个人生活——他几乎逍遥在革命的潮流之外。辛亥革命时期安徽是革命最活跃的省份之一,各种政治力量互相纠结、角逐、分化、联合,一时间政局多变,政治气候阴晴不定,难以捉摸。不过,这个时期陈独秀还在杭州西湖边没有回安徽。陈独秀真正投身于辛亥革命后的政权建设(这是政治活动的一项实质内容),则是受安徽都督孙毓筠之邀约,担任“皖都督府秘书科”的“秘书”。嗣后,他接受继任皖省都督柏文蔚的任命担任“都督府秘书长”,但这已是1912年6月下旬之后的事了。

[参 考 文 献]

- [1] 陈独秀. 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J]. 新青年, 1916, (2).
- [2] 郑学稼. 陈独秀传·蔡子民先生传略:上册[M]. 台北: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社会企业有限公司, 1989.
- [3] 陈独秀. 蔡子民先生逝世后感言[N]. 中央日报, 1940-03-24.

[责任编辑 徐 枫]

Chen Duxiu's Political Activities before the Revolution of 1911

HU Ming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A period of time before the Revolution of 1911 witnessed the participation of Chen Duxiu in the rebellious parties. He once joined the secret "Assassinating Group" organized by anti-Qing personages, and co-founded and led the anti-Qing revolutionary "Yue Wang Hui" (Society of General Yue). However, a lot of related historical facts have remained unknown or lacked confirmation. The paper is aimed at tracing his psychological track in political activities, finding out his logic of thinking in throwing himself into revolution, and interpreting how his style of struggle is shaped. All these display the root cause that he turned to the revolutionary cause later on.

Key words: Chen Duxiu; pre-the 1911 Revolution period; political activities; psychological track

简评《古汉语同义词辨释论》

黄金贵先生的《古汉语同义词辨释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 8 月版)是目前第一部关于古汉语同义词辨释的理论著作。此书是浙江省社科“九五”重点课题,后又被列为教育部“十五”课题。作者针对古汉语同义词辨释的严重缺陷,以实践为基础,展开了全面、系统的理论研究,建构了一套古汉语同义词辨释的理论体系与操作规范。这部书不仅对古汉语同义词辨释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以其深度与广度涉及其他相关学科领域,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同义词研究本身。

现在一般古汉语词汇专书的同义词专章,都是同义词的一般知识介绍,言及辨析方法已是强弩之末,几乎全是汉语词汇学一般知识的移用。本书则摒弃常规,专就同义词研究的根本——“辨释”为总论题,从同义词辨释的实践理析出每个关键性的疑难问题进行研究,并以此结构分章。全书共分八章六题,叙次为界说、功用、同异、传统、构组、方法。理论上的创新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其中有老问题的新总结,如关于同义词的界说,半个多世纪来异说纷呈,作者以简御繁,清理、归纳了长期混杂的三种同义词界说,并逐一给予辨正:“多义相同”说是臆说;“近义”说是误说;“一义相同”说是确说。其中第三说以王力先生为代表,但都断而无论,作者则首次作了理论阐发,使之具有真正的科学内涵。这是迄今对同义词界说公案的最令人信服的总结。本书大多研究的是以往无人问津的新问题,使人耳目一新。如古汉语同义词辨释的性质、特点从来不成问题:古今相同,何异之有?而本书《同异》章着重探讨此问题。作者认为,古今汉语同义词辨析有别,二者除了同义的标准、辨析过程等相同外,在功用、对象、地域、方法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现代的同义词辨析属于词汇学范畴,而古代的则属于训诂学范畴,不少词义要新加训释。由此,作者揭示了古汉语同义词辨释严重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套用现代汉语同义词的研究方法,仅仅在已训释的词义中比较分析,结果自然成果贫乏。此论鞭辟入里,精当服人。本书最着力的是方法论。作者从长期的辨释实践中总结出多手段、多角度、多侧面辨释古汉语同义词的方法,这些方法分两个层面:思辨层,提出系统互补律、名与物相应律、语言与文化统一律,从名物索解文化等四律;操作层,提出语用比较、词义取证、同源推究多重证据凡 4 类 13 种辨异方法。如此方法论,不仅完全符合并深刻反映了同义词研究的特点与规律,并且也是古汉语词义训诂方法的精湛总结,为现代训诂学、词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成果。

丰富的实证是该书的又一特色。作者力避理论的空谈,几乎每提出一种新观点,都辅以有说服力的实证,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取自作者自己的实践,从而为本书的理论构建提供了许多新的观点与丰富精彩的实例。此外,全书设计,各章层层深入、环环相扣,逻辑性强;文风严谨而不死板,语言精练、流畅,还间或夹有幽默之笔,这些都提高了该理论著作的可读性。总之,《古汉语同义词辨释论》是不可多得的一部古汉语同义词辨释理论的创新之作,也是一部独具创意的现代训诂学专著。

(王建莉)